

唐代七夕文学初探

杨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七夕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既与民俗神话密切相关,又与时代精神声气相应,还受制于文学自身的演进。文章详尽分析了唐代各个时期七夕文学的特点,认为正是新体裁的使用、视角的变换和意境的开拓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使得七夕文学不断推陈出新,汇成了独特的唐代七夕文学景观。

关键词:唐代;七夕;文学;革新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03)02-0055-06

中国是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国家之一,节令文化很早就产生了,而七夕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节令,它附缀着迷人的神话传说、奇异的民间习俗、文人的风流雅事以及以此为题材的难以计数的诗作,它们共同汇成中华民族的七夕文化长河。

中国七夕文化源远流长,在《诗经·大东》中就已有关于牛郎织女神话的记述,汉代就已出现了七夕乞愿的习俗。七夕神话传说与七夕民俗衍生最为繁富的时代是在汉魏六朝,那些丰富而精彩的素材曾经给七夕文学以持久的血液和营养,人们利用这些素材,从视角的选取、典故的组合、技法的变换、意境的开拓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造了辉煌的汉魏六朝七夕文学。时至唐代,人们似乎具有更多的理性意识,新生七夕神话与传说故事相对减少。七夕民俗则基本沿袭六朝以来的穿针乞巧,未有大的变化,七夕文学革新必然要走新的道路。

唐代面对的是汉魏六朝七夕文学的辉煌之后的素材与技法的平熟,于是不甘步人后尘的诗人们,要从原有的题材中发掘出新的意蕴来。他们或对原神话民俗进行重新评价和重新阐释,或将原有题材的惯性意蕴进行延展与深化,而这些革新都是与时代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的,于是七夕题材又成了唐人抒发胸怀与表达情趣的载体,唐代的诗人们由此铸造了新一代的七夕文学。同时,唐代七夕文学的革新探索,如重评、重释、延

展、深化等经验又开启了宋代七夕文学新面目的先河。

唐代前期天下承平,自陈代以来的七夕君臣宴饮的风气仍极为盛行,这种风气首先导致了以七夕宴饮为内容的七夕赋的产生。王勃《七夕赋》正好反映了这一风习及其时代心理。^[1]齐代谢朓《七夕赋》写织女妆束的富丽,车驾威仪,离别的凄苦,铺张扬厉,已趋极致。这使王勃作《七夕赋》主观上须另辟路径,客观上七夕风习的发展也使他的另径成为可能。王勃虚拟了一个七夕君臣观星的背景,铺排观星的过程和场面。而后王召仲宣,仲宣乃对以七夕牛女相会及汉武七夕会王母等神话和传说故事,君王乃神情如逸。俄尔天晓,君王又歌舞宴饮,极欢娱之致。尽管其中亦有很多写七夕牛女怨别和汉武王母相会的内容,但其主题已不是牛女怨别,而是一幅七夕宴乐图。这种七夕赋内容的转变显然是受到唐代七夕宴饮风习的影响而产生的,同时,这种七夕宴饮赋的写作必然与唐初天下承平,君臣同庆,需要“润色鸿业”的时代心理有关。

另外,唐初七夕宴饮时,君臣往往互相唱和,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七夕宴饮唱和诗。但这些诗取材大都以牛女相会为主,兼取天河泛槎、汉武

收稿日期: 2002-09-12

作者简介: 杨挺(1974-),男,贵州铜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献。

王母、武丁仙化、对月穿针等典实,杂汇而未贯通,颇显凑逗,应制庚和的痕迹很明显。而手法与取意仍沿袭六朝的套路,无非写七夕节至,织女俨妆会牵牛,春宵恨短,主题取向也承袭六朝以来的悲怨传统。这或许与初唐词臣们大都由陈隋入唐,深居宫廷,习气未改有关。另有宫廷宴饮唱和之外的文人自发的七夕唱和,如任希古《和李公七夕仿谢惠连体》^{[2](P138)}与《和长孙秘监七夕》^{[2](P139)},但其取意与结构亦未脱六朝窠臼,未见创新之处。

总体上看,除王勃的《七夕赋》写到了七夕宴饮的风习外,初唐未有新的七夕神话与民俗素材进入七夕文学,这时的七夕文学从素材到技法大都沿袭六朝七夕文学的套路,缺乏创新。但也应看到,初唐七夕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迹象,主要是取意和体裁方面。取意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七夕诗开始对原有神话意象进行重评与重释。如宋之问《七夕》云“莫言相见阔,天下日应殊”^{[2](P162)},认为七夕牛女并非像人们想象的一年一会,或许天上与人间的时值不同,人间是一年,天上可能只是一瞬间,这显然属于将原有的神话进行了重新阐释和重新评价,而这种重评与重释正好开启了后来七夕文学翻案风气的先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诗歌体裁的发展,七夕诗的表现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陆敬等《七夕赋咏成篇》开始采用七古^{[2](P120)},沈佺期《七夕曝衣篇》开始采用七言歌行体^{[2](P241)},沈宋开始采用五律。在汉魏六朝诗以五古体为主要体裁,而七言较之五言更能写得详尽,律诗较之古诗句法更为严整。由于采用新的诗歌体裁来写七夕题材,七夕诗的表现意境和表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扩展。初唐七夕题材与新的诗歌体裁结合,使后来的七夕诗有了更强的表现力。

二

盛唐时七夕诗数量相对减少,可能由于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塞外边关和山水田园,故而对于这种惯性的悲怨题材不愿过多写及。仅有的几首七夕诗仍以七夕牛女神话与乞巧民俗为内容:崔颢以七夕怨别写宫怨,源于闺怨,难出新意^{[2](P304)};崔国辅纯以七夕神话与民俗事典凑逗,无甚艺术性可言^{[2](P277)};祖咏写乞巧习俗^{[2](P306)};王湾写闰月七夕虽显新巧^{[2](P271)};但都

不能改变杜甫前唐代七夕文学的凋蔽面貌,这时的七夕文学似乎走到了尽头。

此时,人们似乎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不再有大量的新生神怪故事,民间习俗亦已基本定型,不再有丰富的素材供诗人们采撷,而且对传统的神怪故事也要进行重新审视。这由同一心理机制产生的两方面的因素迫使七夕题材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新生。杜甫《牵牛织女》^{[2](P530)}可谓为第一人。

牵牛处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

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妆立,龙驾具曾空,世人亦为尔,祈请走儿童。

称家随丰俭,白屋达公宫,膳夫翊堂殿,鸣玉溱房栊。曝衣徧天下,曳月扬微风。

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终。嗟汝未嫁女,秉心郁仲仲。

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舅姑事,敢昧织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

义无弃礼法,思始夫妇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

与唐代对安史之乱进行反思的时代风气相应,重新高举儒家旗帜成为时代的呼声,其中主要体现为对儒家的道义的重倡,可以说杜甫此诗正好体现了这一要求。而从七夕题材的再生来看,则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七夕文学的重大转折,即取意从对牛女怨别的同情和七夕乞巧的同趣顿转为对二者的批判。来看先贤们的论说,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三引邵沧来曰:

七夕诗从来诸作,不过写仪从之盛,会合之情,别离之苦而已;独公此诗,一起八句即辟倒,中十四句将乞巧正面陈列一番,后一段发出大议论,亦是翻案法;而微言大义,侃侃不磨,自见独开生面。

正如邵公所云,杜甫以前的七夕诗写的大都写“仪从之盛,会合之情,别离之苦”,汉魏六朝诗人于此能事都尽,难以逾越。而杜甫此诗乃作大翻案,发大议论,独开生面,这显然是对传统七夕神话与民俗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评价的结果。而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卷十五云:

此因织妇而及夫妇,见人情不可以苟合……盖夫妇之道,通于君臣,臣一失节,则君将不容矣,妇一失身,则夫将见绝矣。故知大而仕进,小而婚

配,皆当出于至公也。牛女渡河,说既荒唐,旧俗乞巧,愿涉私情,故以夫妇人伦之道讽喻世人。

时代需要提倡“夫妇人伦之道”,杜甫为了彰显儒家道义观念,需要重新规范牛女相会与七夕乞巧,用君臣夫妇之道来评价牛女神话与七夕乞巧,这无疑是一种重评。当这种重评对原神话故事或七夕习俗基本结构和旨趣的变动达到一定程度,破坏了结构的稳固,就成了颠覆性翻案。唐代杜甫对牛女神话和乞巧习俗的否定和后来柳宗元对巧的否定,事实上则颠覆了牛女神话和七夕乞巧的惯性意蕴,打破了读者的“预期视野”,七夕文学具有了新的面目。从此以后,人们不断指责牛女相会传说的虚诞不经、牛女相会的淫媾不道、七夕乞巧的愚昧可笑,继而化用《诗经·大东》诗意批评牛女相会的淫媾与不事农桑的懒惰^⑤。这种做法在宋代得到广泛的支持与仿效,他们否定牛女神话,否定乞巧,否定巧本身,似乎企图建立一个求真、抱朴、守拙,讲求君臣夫妇之礼的道德王国与情感世界。

三

自杜甫《牛郎织女》后,七夕题材再次受到重视,但诗人们并不都像杜甫那样胸怀道义,对七夕神话与民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不像齐梁诗人那样沉浸于织女的凄苦与悲怨,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七夕获得大历诗人的感应,而使他们从中发现新的精神寄寓支点?

首先来看韦应物的《七夕》,“人世拘形迹,别去间山川。岂意灵仙偶,相望亦弥年。夕衣有清露,晨驾秋风前。临欢定不住,当为何所牵”^{[2](P253)},其由人世为山川所隔的形迹之役,联想到天仙灵偶亦有天河之隔离的形迹之役拘,最后“临欢定不住,当为何所牵”,对“心为形役,形为物役”的不自由进行质问,借以表达其对自由精神的向往。此诗取意独特,将牛女视为同盟,以强烈的主观之思想情感贯注其中,从对牛女悲怨凄苦的同情中走出来,从对命运的自怨自艾中走出来,转入对生命的审视与对人生的反省。韦应物此诗如同其山水田园诗一样,深受玄道义理的影响,浸透着对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关系的思索与体悟。

如果说韦应物之《七夕》代表了七夕诗向深层的发展,那么李嘉祐的《七夕》则代表了大历七夕

诗横向的发展。“移家避寇逐行舟,厌见南徐江水流。吴越征徭非昔日,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闭户无砧杵,七夕何人望斗牛。只有同时骢马客,偏宜尺牘问穷愁。”^{[2](P488)}全诗展现了战后江南的荒凉和凋弊,在此凄冷的色彩下,七夕佳节黯然失色:无人穿针、无人观星。此诗写的是战乱中的七夕,作者以冷酷的现实,击碎了欢度七夕佳节的梦想,七夕诗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对现实的关注热忱。由于七夕诗已经是“苟无新意,不必重作”^⑥,故关注现实是一个自然而有效的革新办法。这或许并非诗人刻意去创新的,但李嘉祐的创作方向无疑是适应了反映时世变化与诗歌发展革新的双向要求的。

从以上分析已经可以看出,牛女隔离可与精神不自由联系,而七夕佳节可与战乱无佳节对举,表明七夕神话和七夕民俗题材具有极为丰富的意蕴内涵,原是可以作发散的引申和联想的。这时的七夕诗继承着与时代追求相呼应的精神,转入对生命的审视和现实的关注,进行着纵向和横向的拓展和深化。大历七夕题材重新受到关注,并不是由于其原有的凄苦悲怨的惯性意蕴,也不是采取对七夕牛女相会和民间乞巧进行批判的方式,以传达某种政教理念,而是利用其丰富内涵进行发散的联想与引申,发掘其新的意蕴,诗人的情感栖居其中,才有七夕文学的诗作千篇而不一律,不断出奇,不断创新。^⑦

四

贞元元和七夕文学继承大历七夕文学的深化与拓展精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七夕诗方面表现为宇宙意识的体现和流露,在七夕文方面则表现为对世伪浇薄的愤慨和批判。

中国诗歌中的宇宙意识、时空意识源远流长而绵绵不绝。作者思考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感悟的是人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的寂寞和悲哀,这种情感是超越于个人,也正因为是超越于个人的,所以更具有一般性和持久性。唐人似乎对此颇为敏感,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他们均以一种诗人的敏感和直觉感受到这种个人与宇宙的极大差距,只不过张若虚和陈子昂是由这种差距中产生伤感,而刘禹锡、白居易的七夕诗则利用这差距来消释自

身的伤感。

刘禹锡《七夕二首》其一云“河鼓灵旗动,嫦娥破镜斜。满空天是幕,徐转斗为车。机罢犹安石,桥成不礙槎。誰知观津女,竟夕望雲涯”^③[3](P934),先写牵牛(星)与嫦娥(月)共出,接着写七夕星空,斗转星移,“机罢犹安石,桥成不礙槎”,寓示宇宙万物各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知观津女”句由天上及于人间,写乞巧女之痴,“竟夕望雲涯”,即为不明宇宙的生生规律,自作多情。其二云“天衢啓云帐,神取上星桥。初喜渡河汉,频惊转斗杓。余霞张锦幢,轻电闪红绡。非是人间世,还悲后会遥。”亦寓斗转星移,时间飞逝,世事运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使人们联想到其《天论·中》之“天何预焉”^④[4](P6128)的慨叹,他要表明的是天命不可干预,世人只能顺天而行。刘禹锡此时并没有丝毫的伤感,相反表露的是通达物理后的顺化。

白居易《七夕》,“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霄中”^②[2](P1175),首句言秋令夜空,突转至“银汉秋期万古同”,此“万古同”使“欢情离恨”顿时出离于个人之悲怨,上升到一种人类的普遍性情感,由狭隘的幽怨转为一种普遍的悲怆感。这使人们自然地想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之“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之“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人类在宇宙中生存,与宇宙相比,自身太短暂、太渺小,这往往让敏感的诗人产生无法释怀的悲怆感,但将自身的情感与宇宙相比,这些悲欢离合又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将七夕题材与天道观结合起来,与中唐时的理性思维发展有关,而与理性的天道观相应,刘禹锡和白居易的七夕诗不再像张若虚与陈子昂那样,由人生与宇宙的巨大差距而生发无尽的悲怆与伤感,而是充满着对天运与人世变化的通达与顺化。

在唐代的七夕习俗中,原有一种于七夕作文以乞巧的习俗,这种文就是“乞巧文”,权德輿有诗《七夕见诸孙题乞巧文》,其云:“外孙争乞巧,内子共题文。隐映花奩,参差绮席分。鹊桥临片月,河鼓掩轻云。羨此婴儿辈,欢呼徹曙闻。”^②[2](P812)描写了七夕夜乞巧时作乞巧文的情景。沈亚之有《为人撰乞巧文》^④[4](P7607),全文代一位妓妇七夕乞

愿,表示乞巧文确实是应用于乞巧习俗的一种文体。但真正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却是由柳宗元所作的《乞巧文》^⑤[5],这一篇名为“乞巧文”实为“却巧文”的乞巧文,对“巧”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柳氏历数所谓“大巧”者混淆是非,玩弄阴谋,投机骑墙,摇唇鼓舌,曲意奉承。在世流却如鱼得水,而自己刚直不阿,坚持真理,嫉恶如仇,则四处碰壁的种种不平之遇,后假天孙之口表明非己不能为之,实乃不愿为之,情愿“抱拙终身”的刚强信念。此虽在沈文之前,但实是伤世浇伪,故作激愤之言,于后世影响颇为深远。后此不久的孙樵即有《乞巧对》^④[4](P8332),历数巧之在言、巧之在文、巧之在官、巧之在工的种种颠倒黑白,曲解是非的丑行,后表明自己以拙为宝,并希望世风复归于朴,将柳子文意敷衍甚详,可见孙柳于此同趣。

这种对巧的否定态度在中国本有文化渊源。《诗经·鹊巢》已有鹊巧鸠拙的说法,《庄子·逍遥游》有“瓠大无用”的思想,《论语·学而》云“巧言令色,鲜矣仁”,《楚辞·离骚》云“雄鸠之鸣逝兮,吾犹恶其佻巧”,可谓源远流长。但柳宗元身处于重倡儒家道义的时代,现实的世情浇伪与理想的仁义中立的反差是如此之大,出于对世巧浇伪的激愤,第一次借七夕乞巧文的形式表达出来,与杜甫在诗歌领域的重倡君子进身之道相呼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只不过杜甫是对七夕神话与乞巧习俗进行批判,而富于战斗精神的柳子厚则借乞巧文对“巧”本身进行了否定,其斗争指向更为明确,即“閔时奔骛”^⑥。其后孙樵承之,宋·梅尧臣《乞巧赋》、元·杨维桢《乞巧》、明·王达《却巧文》皆仿此作,表达其对“巧”的批判态度,足见其精神与方法绵延不绝,影响深远。

从刘白之七夕诗到柳宗元之七夕文(乞巧文),显然与当时的儒学运动有关,运动直接提倡的是道学,而道学必然地要上与天命、下与仁义一贯,故而在此一时期的七夕诗与乞巧文中,本着与时代追求呼应的传统,其中自然会透露出诗人们的天命观与伦理观,从天命观出发有了“天何预焉”的感慨与顺化,从伦理观出发有了“抱拙终身,以死何惕”的愤慨与执著。

五

随着中兴梦想的幻灭,晚唐文学也就不再那

么热忱地关注现实的政治伦理了,人们仍然以七夕为题材进行创作,但此时的七夕文学也不再热血沸腾地讨论天道人伦,七夕文学中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活与感受,于是开始将七夕题材的惯性意蕴进行延展,七夕文学体现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悼亡,由于采用联想的思维方式,由生离自然而至死别。李商隐《七夕》(大中七八年)一二句写牛女别,三四句“争(怎)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2](P1367)},几多悲切与哀怨,凄婉肠断,情感重心顿至死别。“无期别”实开后世以七夕写悼亡之先河,于此亦可见义山写情之一斑。赵彦《七夕》(一作李郢作)“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迴”^{[2](P1386)}亦表示一年一会虽少,但远胜人间死别,亦与义山《七夕》取同一角度。如果说卢殷《七夕》“全胜客子嬾,十载泣生离”^{[2](P1191)},以比不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来进行自我宽慰,那么这里已不是表示对牛女“稀相见”的释怀,生离之焉如死别,而是吐露对人间死别的揪心之痛。这显然属于七夕题材惯性意蕴的延展。二是谑趣,温庭筠《七夕》颌联“天上岁时星右转,世间离别水东流”^{[2](P1480)},先将牛女会别赋予一种时空感,末联“苏小横塘通桂楫,未应清浅隔牵牛”,迅速转入人间之情,谓钱塘苏小小泛舟横塘(桂楫)应不会与其情郎有河汉之隔吧!此诗由极广大到极精巧,由极久远到极目前,而其间转化甚疾,故能有谑趣之效果。三是寄寓,如李商隐《辛未七夕》(大中五年)^{[2](P1365)}谓七夕相会,乌鹊有功,何至于对乌鹊薄而对蜘蛛厚。义山此诗从素材上来看是利用了牛女以鹊桥相会与乞巧以蜘蛛为徽的不相关性,其间当然有针对小人道长而君子道消,小人得势而君子受屈之不平现实,愤慨而鸣的现实政治指向性,但其关心的焦点还是自身的困居下僚的际遇。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晚唐七夕诗不再像六朝诗人津津乐道于牛女的悲怨与别离,也不再像中唐诗人们那样关心天道与伦理。悼亡也罢,谐趣也罢,寄寓也罢,他们关注的是自身的生活与感受。这种对自身的关怀必然要对七夕题材的原有意蕴进行延展。从七夕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当然会引起意境的深化与细化。七夕题材成为作者独特感受的载体是从韦应物开始的,借七夕之酒杯,浇胸中之块磊,正体现出对原题材惯性意蕴的超越。由于诗人主观情感千差万别,七夕诗的主

题取向不再限于六朝以来的常规怨别,而向多元化发展,较之六朝七夕诗而言,其个性色彩越来越鲜明,情感越来越深化和细化。在创作方法方面则表现为径以己意行文,以气势驱动文脉与意流。如李义山《辛未七夕》,其间“恐是”,“岂能”皆属疑问词,承启全诗意流,径写其胸中意见,故而文势一气而下,不守情景交融之法。这种方法的采用无疑也正是情感表达的需要与选择。

通过对有唐一代七夕文学面貌的剖析,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学景观。七夕文学——这一与中华民族之七夕神话与民俗血肉相连的文学形态,既与神话和民俗的发展息息相关,又与时代精神的脉搏声气相通,随着诗人们的努力,不断的推陈出新。唐代七夕文学较之于六朝七夕文学,由于七夕神话与民俗基本定型,素材吸纳创新可能性不大,而原素材的惯性意蕴又被汉魏六朝诗人发挥殆尽,唐人于是从六朝的代意的模式中走出来,展示自身的情感与思想。而诗人生活于时代中,诗人的思想情感在士气激扬的时代,反映出时代的精神追求,七夕题材成为诗人胸臆的载体;在缺乏政治理想的时代则更多地流露诗人对自身生活与感受的关注,七夕题材则成为诗人情趣的栖居地。另外,唐代七夕文学革新的探索,如重评、重释、延展、深化等经验亦给宋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宋人正是踏着唐人走过的路而前进的,宋代七夕文学较之唐代更为繁富、更为壮观,但宋人的每一种做法,都是唐人尝试过,只是宋代将之变本加厉,踵事增华而已。

注释:

- ① 参见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 P114-115。
- ② 参见叶大兵、乌丙安等编《中国风俗辞典·岁时节日类》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版, P5。
- ③ 笔者所讨论的七夕文学是以七夕神话传说和七夕节候以及民间习俗为题材的一切中国文学。在具体操作中,以如下标准进行:一、凡是标题为“七夕”(或七月七日)或“XX 七夕”的,一律纳入研究范围;二、标题不合上条要求,但其素材和意趣显然来源于七夕神话传说和民俗者,也一并纳入。这样在讨论七夕文学时才比较明白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 ④ 谢朓《七夕赋》可见于丁福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卷二十三。
- ⑤ 比较盛大的有两次:一是高祖时,陆敬、沈叔安、何仲宣、许敬宗以《七夕赋咏成篇》为题,共咏七夕牛女相会之事。二是高宗作《七夕宴悬圃二首》,许敬宗有和作。此习俗在中宗时依

然风行,据《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谈丛》三“皇帝赋诗”载,“中宗景龙二年七夕(案疑脱宴)两仪殿”,君臣唱和,李峤、刘宪、苏颋、赵彦昭、杜审言皆有和作(可参见《唐诗纪事》卷一、卷二、卷三的有關於載)。

- ⑥《诗经·小雅·大东》有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说的正是牛女的虽名务耕织,但事实上却徒有虚名。唐人有从此处发挥者,如卢仝《月蚀诗》有云“痴牛与驂女,不肯勤农桑,徒劳含淫思,旦夕遥相望”。
- ⑦清·陆以湑《冷斋杂识》卷七引《金德铉说》(此转引自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P45之《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
- ⑧这种深化与拓展对宋人影响甚深,如苏辙七夕诗词抒写性情,辛弃疾、汪元量等七夕诗词写家国之恨,与此皆不无关系。

- ⑨清·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P834)谓“似当为宫闱中失宠之妃妾而作”,从诗面看来,难以索解,故本文不取其说。
- ⑩《柳宗元集》卷十八引详注云(中华书局1979年版P487)。

参考文献:

- [1] [清]蒋清翊.王子安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24.
- [2] [清]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 [清]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34.
- [4] [清]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87.

Study of QiXi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YANG T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features of QiXi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of QiXi Literature in every epoch. The author pointed out: based on the change of the points of view, development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responses to the time spirit, QiXi Literature has been weeding through the old to bring forth the new literature scen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QiXi(七夕); literature; renovation

北航人文学院骨干教师赴国外培训考察

2002年,北航人文学院积极落实国家高层次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把公派出国进修作为教师培养的重要途径。2002年7月至2003年1月,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高校系主任、研究所骨干出国研修计划”资助,该院副院长兼高教所所长雷庆教授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2002年10月,该院经济学系隋学礼副教授顺利通过教育部公派教师选拔考试,赴德国马堡大学经济学系进修德中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政策等,为期一年;2002年6月~2002年9月,由国家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师及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项目”资助,该院公共管理系系主任方卫华副教授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参加公共管理培训,参加了“公共管理理论”、“人力资源”、“组织理论”、“公共政策”等相关课程的学习以及该项目组织的实践调查活动,参观考察了美国加州州政府、洛杉矶市政府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的运作。通过培训和实地考察,对美国的教育管理、公共管理有了直观的感受,初步了解了美国公共管理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促进了对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认识。